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陈金城口述 邱行湘笔记 (1)
回忆在“四·一二”政变前后黄埔军校的一段生活	周文在 (17)
回忆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两次谈话	沈维岳 (27)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总统府	朱明镜 (34)
附：蒋介石总统府示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见闻数则	汤又新 丁绍兰 (49)
宋美龄的姊妹情谊	王正元 (56)
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经过	方庆延 (59)
一九二九年江苏省国民党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杨 谷 (71)
萧铮和国民党的“地政”	王世琨 (76)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编余军官哭灵记	汤燕生 (87)
司徒雷登与南京四十八教授的“和平呼吁书”	刘敬坤 (93)
中统侦缉《文萃》案的前前后后	倪得珉 (98)

《文萃》社及三烈士殉难纪实	骆根清 (106)
我和《文萃》三烈士在狱中	韩月娟 (119)
我国名列第三的一九三〇年国际博览会实况	田守成 (121)
对陶行知的片断回忆	吴树琴 (131)
怀念我的父亲王礼锡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活动	王士志 (137)
回忆盆景艺师周瘦鹃	高德举 (144)
祖传蛇药今昔谈	季德胜 口述 祖丁远 记录整理 (154)
苏州刺绣	任嘤闻 (164)
读者·作者·编者	
关于蒋介石的出身	上海文史馆员张 端 (175)
次序颠倒文义不符之处应予更正	山西省政协赵文朴 (175)
致读者	江苏省政协委员钱钟汉 (176)
大力发掘和整理江苏文史资料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76)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勘误表	(178)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陈金城口述 邱行湘笔记

奔 向 黄 埔

1924年2月，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我的中学同学陈道、邱元武瞒着父母，秘密地跑到上海，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可是陈道、邱元武的父母，坚决不许他们到广东黄埔军校上学，硬把陈、邱两个爱国青年拉回家。我的父母也很保守，爱子如命，深怕我沙场丧命。我把我的志愿告之于我的姨父盛竹虚，姨父比较开明，为我写了一封信给杨虎（杨虎，安徽无为县人，是我姨父盛竹虚的学生，杨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春，我排除了家庭的种种阻拦，毅然冒着军阀查拿盘诘的危险，奔赴广东。我到广州以后，我持姨父盛竹虚给杨虎的介绍信，去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去见杨虎。杨虎展阅盛函，即时委任我为司令部“差遣”，我因没有军事知识，当不好“差遣”，于是决心投考黄埔。但这时黄埔还无招考日期，心里十分焦急，适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办了一所警卫军讲武堂，我先去应考，学点军事知识，以待黄埔军校的招生。

我投考警卫军讲武堂的结果，以备取第一名勉强被录取入学。警卫军讲武堂堂长是蒋群羊，江西人，地方主义十足，蒋群羊只收江西同乡，其次收了一部分广东人，其他各省的考生，程度再好，也被剔除。而我则是例外。我这个安徽全椒人，恰恰与广州公安局有一位张会计长是全椒小同乡，我就托张向吴铁城说情。吴铁城

马上写了一张条子给蒋群羊，为我打了招呼，我虽然不是蒋群羊的江西同乡，也给备取第一名，进了警卫军的讲武堂。

提到蒋群羊专收他的江西同乡，我也十分气愤，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江西人胡静安和我在一个桌子上考试，胡静安不学无术，他的考卷多是偷抄我的，因为胡静安是江西人，却名列前茅。而我，要不是张会计长央请吴铁城写了一张条子，我就名落孙山了。

广东的形势十分复杂，除黄埔以外，可以说没有多少干净土。时孙中山任大元帅，决心北伐，督师韶关。

英帝国主义长期豢养的已经入了英国籍的汇丰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陈廉伯，兼任广州市商团总团长（武器装备优良），置之于孙中山先生革命根据地的腋肘。英帝国主义供给陈廉伯大批新式武器，唆使陈廉伯在广州及佛山两市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商团与孙中山对抗。

商团的装备多用外国武器，最后使用的一批武器是加拿大进口的，团兵多穿黄色卡机布军服，佩带黄底白字袖章，外表阔绰，人们称之为“洋兵”。当时，政府的警卫军、工团军、民团军的装备远远没有商团精良，后来孙大元帅调来的黄埔军也是草鞋兵，可是革命军的士气非常旺盛，经一昼夜的战斗，全歼陈廉伯叛军。

警卫军讲武堂参加平乱战役有功，奉孙大元帅之命，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但进军校二期，还得经过一番考试，因为我有吴铁城为我说话，自己也有些文化，当被录取，且名列前茅。这时，我踏进了这座革命学府，真是无比欣慰，夙愿已偿，意志更坚。

黄 埔 生 活

1924年10月以后，孙中山先生常常回校工作，孙先生对二期学

生进校十分关心。第二期步兵学生驻校本部，和孙先生的办公室在一起。孙先生日夜辛劳，常常对我们讲话，勉励我们要和他在一起，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要我们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要我们“亲爱精诚”。我受孙先生感召，取号“精诚”。孙先生起床很早，经常到各队视察我们的生活，有时还检查我们的内务。黄埔军校不仅外表上严肃活泼，一进校门就令人肃然起敬，一般都是充满了革命的热情。

1924年9月，周恩来主任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驻在校本部，周主任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周主任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全校同学对他十分尊敬，我们都尊称为周老师。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时聂荣臻是我们的军事教官，并任校政治部宣传处长。

1924年年底，我们的总理孙中山先生，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毅然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以期和平统一中国，谋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山先生离开黄埔以后，我怎样也难以忘记他的伟大音容笑貌。

孙中山先生北上后，校务全由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原在粤军许崇智部工作，任许的参谋长，1923年蒋到上海，迎接孙先生回粤，他对孙先生表示“忠诚”，在国共合作后又以左的面貌出现，被孙先生选送苏俄学习军事，蒋归国后，于1924年初受命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军校党代表为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先为邵元冲、戴季陶、邵力子，1925年8月以后由周恩来担任，教育长先是胡谦，后来是王柏龄，总队长为严重。第一期于1925年1月在东征途中毕业。一、二两期总共学生为一千多人。一、二两期在校学习期间都不到一年，为期仅七个月。

军校政治部除对全校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外，在黄

埔岛上做了很多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

黄埔军校校内外的工勤人员多是岛上居民担任，而且多是青年女工。他们的政治觉悟很高，搬运工、勤杂工无不忠诚老实，以主人翁姿态对待本职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搬运军火、大米，没有任何损失和差错，这充分说明了军校政治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多么深刻、细致。

我在军校，记得1924年年底1925年初，正好是新春过年的时候，蒋介石集合我们学生讲话，他说：“我家里有好东西，希望你们到我家里去。”这时同学们轰动起来了，不知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拿到，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校长家里，谁知拿到的是一本《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为什么对黄埔同学们做出这手花招，无非是要他的学生学习曾国藩、胡林翼两个奴才，“忠”于蒋介石自己，来维护他的统治。后来，这本小册子成为军校中每期的必修课程，人手一本。

黄埔军校的教育管理，基本上是采取日式的课程内容，以学习战术、筑城、兵器、地形四大教程为主，与术科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的解讲演习相结合。军事教官除一部分士官生（留日）外，大部是保定军校出身，队职人员也以保定出身的为多，教授部主任王柏龄除邀请何应钦来黄埔担任战术总教官外，还吸引了一些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来担任黄埔军校的干部。英、法、德、意的留学生为数甚少，有编译处长孔韦虎、聂荣臻教官等，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此处还有苏联教官五人，日本教官一人。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很高，有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也偶有一些犯错误的学生，发生一些严重的事件，只罚禁闭一、二日，被开除学籍的就不多见了。

政治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细致、深刻。周恩来主任到校后，几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全校学生里面。

我记得到校后编入工兵队，因该队缺乏工兵器材，学不到技术，我和一位江西同学徐树南要求调到步兵第五队。后来我在第五队担任小组长，学习一个时期以后，组里有些同学自觉性不够，批评也不济事，我不愿再当组(班)长了，向区队长、队长提出辞职不干。周恩来主任知道了，他到班里看我，问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过了几天，周主任又到班里问我：“现在还有人反对你没有？”我答以“没有人反对我了。”周主任微微一笑。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当好班长，同学们的自觉性也提高了。

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联想到1962年春节，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我和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溥杰、宋瑞珂等的时候，还记得我是第二期的学生，我说：“我走错了路，对不起老师。”周恩来老师马上回答我说：“不能这样说，还是我和你们接近得太少。”我听了周老师这句话，愧感交集，不禁热泪盈眶。

政治部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办了一份《黄埔潮》，成立了“血花剧社”。

难忘的党代表——周恩来

1924年秋，孙中山先生向中共请调周恩来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这是按照俄国红军的体制，在我国是第一次在部队里设置政治部，这是军队之有政治工作的开始。

周恩来主任在军校工作最长的时期是黄埔第二期。我记得1924年10月我到黄埔，就听到周主任对我们讲话，开始的讲题是“新三民主义”。王柏龄在军校任教授部主任，他以胡汉民、邹鲁等为后台，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进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周主任总是顾全革命大局，做了很多团结工作。

周恩来主任在第二次东征时兼任第一军党代表。他在两次东征平定地方叛乱势力统一广东的功绩是说不完的，仅就我亲历简述如下：

① 身先士卒，鼓舞士气。黄埔军队作战中，政治部总是走在部队的先头，周主任总是走在政治部的先头。当部队转移时，周主任却是走在部队的后面，有次在前线转移时，我当面请周主任走在部队的先头，我请周主任注意自己的安全，周主任说：“这是党代表的责任。”他仍是部队的最后一个人。

② 政治部既是部队的后勤队，又是部队的宣传队。行军时政治部走在部队先头，为部队代办粮食、稻草，分配宿营地，为部队雇用民伕响导。我军所到之处，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军在陈炯明盘据的东江作战，由于民间粮食多数被叛军抢光、吃光，我军购办粮食十分困难。军队之用炒米袋，就是周主任总结作战中的经验发明的，传之今日，仍为我解放军不可缺少的装备。

③ 党代表当宣传员。1925年3月，我们学生军攻克淡水，经海丰、陆丰，在棉湖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取道安流，直趋五华、兴宁、梅县地区。周主任亲自率领学生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深受群众的拥护，起了播撒革命种子的作用。同时又通过发动群众送情报，做响导，组织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使东征军得到人民的支持，无往而不利。

我军所到之地，在群众欢迎大会上，周主任都要亲自做宣传工作，闻名于革命根据地的“血花剧社”在政治部领导下，更是出色地做了鼓励群众、瓦解敌军的革命工作。

周恩来是第一军党代表，还要参与前线的作战指挥，他在担任黄埔军校及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以后，提出了《战时政治宣传大

纲》，使东征军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军民鱼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两次东征，消灭地方叛乱势力统一广东的伟大胜利。军队之有政治工作，是我军打败敌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主任在两次东征中，除指挥和鼓励部队作战外，还指挥各地农民协会武装配合，使东征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突出地表现在1925年10月24日攻克惠州，乘胜追击，从10月中旬到11月初半个月內连克惠阳、河源、紫金、五华、揭阳、海丰、陆丰、兴宁、梅县，11月5日进入汕头，政工人员随部队的先遣侦察人员走在一起，所到之处，都可以见到“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国民革命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不拉夫”、“不筹饷”、“不占民房”、“公平买卖”的标语。而东江人民对革命军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还为我们送情报、搜剿残敌。在群众中流传一支歌曲，到处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可见军民敌忾同仇，对陈炯明的叛军，则恨之入骨，而周恩来主任的革命功勋，是黄埔学生和广东军民永志难忘的。

追忆共产党员惠东昇

惠东昇同志早年毕业于南京李纯办的军官教育团，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惠东昇在军校历任第一、二两期的区队长、队长。黄埔成立教导团后，惠东昇调任教导第一团第一营长，作战勇敢，第二次东征攻惠州城后，升任第四团团长。

惠东昇是江苏宜兴人，迁居溧阳县南渡镇。记得惠东昇曾对我说过“我是到日本的时候参加共产党的”，我没有详询年月。

1925年10月，我在第一师任上尉参谋，惠调我任该团辎重队

少校党代表，我想担任带兵工作，惠又把我调任第四团连长。

1926年春，第二师集中广州训练，惠东昇又调任第二师第六团团长，惠对我很器重，又调我任第六团第四连连长。时驻广州造币厂。

1926年夏，我军出师北伐，进攻湖南，蒋介石知道惠东昇带着行军，随即下令撤去惠东昇团长职务。北伐军进占南京后，惠东昇凭何应钦的关系，出任江都县长，后又被撤职扣押。

1929年，刘峙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保荐惠东昇到河南工作，刘峙任惠东昇为河南某部旅长，又被蒋介石查觉逮捕，由河南解到南京，后来被蒋介石杀害。

惠东昇作战勇敢，东征有功，我和惠东昇共过患难，惠东昇知我尤深，对这一黄埔军校建校有功之人被蒋介石杀害，极为痛心，在我黄埔二期的生活中，是永远难忘的。

激烈的两派斗争

青年军人联合会 1924年9月我进黄埔军校第二期之前，校内已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旨在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以影响当时在广东的各省部队，改变他们封建割据以及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增强广东革命军的力量。这个组织是以拥护孙总理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为宗旨，以推动国民革命。这个团体本是学校的公开政治组织，由第一期学生蒋先云等筹备组成，与在广东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的学生联系，归黄埔军校校长、党代表直接领导，周恩来来校任政治部主任后亦系领导人之一。当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伊始，蒋介石亲自为该会写了一篇宣言。

我适于此时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二期，由区队长惠东昇介绍我正式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二期的同学共产党员周逸群、王一飞等都在该会积极活动。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及广东各军及其他革命机构中进步的革命组织，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阴谋破坏，并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国民党极右分子如胡汉民、戴季陶及后来参加西山会议的如谢持、邹鲁等，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眼中钉。

孙文主义学会 黄埔军校以戴季陶、王柏龄为首，纠集二期黄埔同学杨幸之、史宏熹、谢廷献、胡静安等为骨干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黄埔第二期学生为发展组织的重点。时孙中山先生北上病危，他们借孙中山先生学说思想为号召，标榜要保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污蔑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第一期黄埔学生极右分子贺衷寒、潘佑强、冷欣、胡宗南等，均属孙文主义学会的领导层。学会领导人中还有鄧悌、邓文仪。

我受了他们的影响，也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适合当时我国的国情”，转而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

我记得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林振雄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李汉藩争吵，不仅动武，林振雄还以手枪打李，幸未击中，经廖党代表处理，将林撤职，李亦记大过一次了事。

在一、二次东征中，两派斗争更烈，幸有周恩来主任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因此在对敌斗争中没有发生重大事件，仅在梅县时，贺衷寒与李之龙在集会上发生冲突，一直闹到蒋介石面前，后来蒋介石把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贺衷寒也受到撤职处分。

1925年10月，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潘佑强、杨幸之等在广州中山大学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周逸群、王一飞辱骂，甚至动

武，后来遭到回击，双方大打出手，都受了伤。两派斗争闹成水火不容的地步。

1926年3月初，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也停止活动，表示“公允”。

蒋介石为了既要利用共产党员，又要分化共产党人，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熔国共两党的青年于一炉，由两会合组一个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来操纵一切。实际上，黄埔同学会这个组织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继续。

蒋介石指派蒋先云(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曾扩情(原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后退出)、李之龙(黄埔一期共产党员)、潘佑强、田载龙、贺衷寒、冷欣、余洒度、贾伯涛、伍翔、杨幸之等为筹备委员，组成了黄埔同学会。该会成立后，其成员大部分是反共急先锋，后来如潘佑强、贺衷寒等竟成了蒋介石的特务爪牙，十三太保的成员。我记得李默庵本是共产党员，后来也担任了同学会科长，从此向右。第二期同学林垣(广东人)，当时担任黄埔同学会俱乐部主任。还有二期同学胡静安，也是黄埔同学会的骨干。胡静安二期毕业后，分配到蒋介石身边当参谋，第二次东征时随蒋工作，常常穿上蒋介石的黑大衣招摇撞骗，胡作非为，连刘峙、钱大钧都怕他。胡静安这个人偷看我的卷子才被录取，但是蒋介石却很重用他，不久当上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

东 征 北 伐

1924年年底，总理孙先生一面决心建校建军，进行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为了和平统一离开了黄埔，发表北上宣言，去北京与南北

各方面的代表开国民会议。

孙先生离开黄埔后，广东的形势更为混乱，陈炯明盘据东江，受英帝国主义和曹锟、吴佩孚的唆使，阴谋袭击广州。孙中山先生早已窥破陈逆阴谋，北上前，曾对黄埔军及在粤一部分服从孙先生的军、师策定了东征计划。在1925年1月、10月进行的两次东征，消灭了英帝国主义直接豢养的陈廉伯反动商团以及陈炯明、洪兆麟、林虎、杨希闵、刘宸寰、邓本殷等各部叛军，统一了广东。

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成第二师，积极从事补充训练，调整人事，刘峙任师长，由惠东昇、蒋鼎文、严尔艾分任四、五、六团团。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生担任营、连级干部。部队战斗力很强，士气旺盛。

广东的黄埔军队和在粤各军均改称国民革命军，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志，下令北伐，任东征军总指挥、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郊场誓师北伐，在广州的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军政人员群众团体数万人，参加了誓师大会，先由蒋介石讲话，接着是邓演达讲话，最后由吴稚晖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领导人为：

总司令蒋中正、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长邵力子、总参谋长李济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参议钮永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设14个处，其主管人员大部由黄埔军校调任，我现在能够记忆到的有：张治中、张廷璠、严重、林振雄、张静愚、邱鸿钧、杨志春、陆福廷、徐桴等。

北伐军的战略部署是：以国民革命军主力由韶关进击湖南及湘赣边境，直趋武汉，歼灭吴佩孚盘据湘鄂的主力部队。得手后，挥师德安迎击孙传芳部，聚歼该部于南浔线，以有力之一部由潮汕

进击福建，直趋江、浙，摧毁孙传芳的巢穴。我军以十万之众与四十万之敌决战，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因此，北伐军决心先打垮吴佩孚，再歼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

北伐军出师时，计有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唐生智于1926年5月1日在衡山归顺国民政府后，被任为第八军长，兼前敌总指挥。

北伐军于1926年7月10日占领醴陵，7月12日攻克长沙，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已告完成。

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长沙，召集军长以上人员开军事会议，15日发出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以黔军袁祖铭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就任第十军军长，以该两军为左翼军，由袁祖铭任总指挥，从湘西出荆州、沙市地区，封锁长江上游。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中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直趋武汉，夺取武胜关。以第二军、第三军为右翼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集结攸县、醴陵地区，监视江西来犯之敌。第一军第二师、教导师和第六军为总预备队，集中长沙、平江、浏阳待命。

中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的兵力布署，以第八军进攻南渡、岳阳，第七军进攻浯口市、长乐街；第四军进攻平江，直取通城、崇阳，进击粤汉铁路，切断由岳阳至武汉交通。决定于8月19日开始总攻。

在第四军平江战役的同时，李宗仁第七军占浯口市，越汨罗江，克长乐街。唐生智第八军夺取新市、南渡，跨过汨罗江，进迫岳州，敌人纷纷溃退。第四军攻占平江后，日夜兼程向大沙坪、崇阳、中伙店、汀泗桥兼程挺进。我第二师担任总预备队，沿粤汉铁路线跟进。全师官兵急求与敌决战，参加汀泗桥的进攻战。这时，第二

师仍未获得进攻任务。8月27日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

我军攻克汀泗桥以后，得悉吴佩孚南调大部援军到达汉口，孙传芳的精锐卢香亭部到达九江、湖口，吴、孙阴谋联合进攻北伐军，妄图挽回颓势。

这时，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向南昌前进，指挥在南浔以西各军迎击孙传芳的主力进犯，予敌歼灭性的打击，策应北伐军各路军之作战。

第二师担任攻击汀泗桥预备队，待第四军进攻奏功后，我第二师第六团担任追击敌人之任务，我先头部队直追至贺胜桥附近。我当时要求担任对贺胜桥的进攻，上级仍要调我为预备队，我很不服气。

8月30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攻克贺胜桥，第二师急追逃敌，吴佩孚的溃败部队，麇集纸坊，未作抵抗，即退入武昌城。

武昌扼湘、鄂长江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城高两丈，城郊平坦开阔，易守难攻。第二师担任与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的任务。当时武汉的形势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一败于平江，再败于汀泗桥，三败于贺胜桥，退守武昌，以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守事宜。以湖北军务督理陈嘉谟、第八军军长兼湖北省长刘玉春固守武昌待援。并调集陈嘉谟第二十五师、宋大霈第八师、吴俊卿第三师、孙建业第一混成旅等残部共约三万余人据守。另以刘佐龙师守汉阳，高汝桐师守汉口，形成犄角之势。并促孙传芳出兵湘、鄂，妄图截断北伐军后路，以解武昌之围。

1926年9月2日，我中路军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到达武昌附近之余家湾车站，策定攻城计划，决定9月3日拂晓总攻，以第四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师进攻武昌；以第八军袭击汉阳，攻占汉口，进击武胜关，截断敌军南下增援。